



火鳳凰

學術遺產叢書

總體策劃

陳思和 賀聖遂

八代傳叙文學述論

◎ 朱東潤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八代傳敘文學述論



朱東潤著

傳敘文學是文學史的一部分。文學史的主要對象是人。同時傳敘文學轉便肯定了傳敘文學和一般歷史之

較新的民族比較地注

其所以不定的敘述程也不免看

底上射顯上叙述是金文底作語

敘述目下學公及符像對格不許。卷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八代傳叙文學述論 / 朱東潤著 ·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11

ISBN 7-309-05252-8

I. 八… II. 朱… III. 古典文學—文學研究—中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6) 第135864號

八代傳叙文學述論

朱東潤 著

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國權路五七九號 郵編：200433

八六—二一—六五六四二八五七（門市零售）

八六—二一—六五一—八八五三（團體訂購）

八六—二一—六五一—〇九一四三（外埠郵購）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責任編輯

韓結根

總編輯

高若海

出品人

賀聖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學院印刷廠

開 本

八五〇×一一六八 三十二分之一

印 張

八·五 插 頁 三

字 數

二〇三千

版 次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一一六〇〇〇

書 號

ISBN 7-309-05252-8/I · 366

價 十八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民國三十一年寫定《八代傳叙文學述論》，是為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四種。

師友琅邪館是我讀書之處。少年時候，最欽服邴曼容為人，其後築宅，因取杜牧《長安雜題長句》「九原可作吾誰與，師友琅邪邴曼容」之意，建師友琅邪館。中年以後，更羨慕王述。《世說》記謝萬見述，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述答：「非無此論，但晚令耳。」因此又題書齋為晚令齋。

民國二十九年，《讀詩四論》出版，是為師友琅邪館撰述第一種。是年又取《史記考索》及舊著《中國文學批評論集》付開明書店，是為第二種、第三種。此外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於民國二十一年完成，中經刪訂兩次，擬重行寫定為《中國文學批評史》；讀元雜劇四論，已完成《元人雜劇及其時代》一篇，尚待續寫；連同未經寫定的《晚令齋集》，共為三種。關於這三種的手稿和書籍，大都寄存漢口，對日抗戰尚未結束以前，固然不易取出，即是抗戰結束以後，能否全部收回，亦不可知。所以這三種撰述底完成，遙遙無期，師友琅邪館撰述第五種，只有另行著手了。

在寫成《史記考索》的時候，我開始對於傳叙文學感覺到狠深的興趣。接著便擬叙述中國傳叙文學

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罅隙百出，眼見是一部無法完成的著作，所以只能寫成一些綱領，從此束之高閣。在這個時期中，看到漢魏六朝傳敘文學，尤其不易捉摸。除了幾部有名的著作以外，其餘都是斷片，一切散漫在那裏。但是即使要看這些斷片，還得首先花費許多披沙簡金的功夫。嚴可均底《全兩漢三國六朝文》，總算是一種幫助，但是嚴可均所輯存的，不過百分之五，其餘還需要開發。就是幾部有名的著作，有單行本可見者，其中亦多真贋夾雜，仍需一番辯訂考證的工作。不過中國傳敘文學惟有漢魏六朝寫得最好，忽略了這個階段，對於全部傳敘文學，更加不易理解。所以我決定對於這個時期的傳敘文學，盡我底力量。

工作是相當地繁重，工具又是那樣地缺乏，有時連最普通的書籍都不易獲得。但是既經決定動手，便顧不得困難。最後總算在單行的著作以外，從斷簡殘篇中給我搜獲了四百餘種的著作：有時只是一句兩句，有時竟是萬字以上的大篇。由搜獲到鈔集，由鈔集到考訂，一切都是「一手一足之烈」，沒有人幫助，也找不到人幫助。「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真是值得玩味的言論。材料大體完備以後，工作便比較簡單，但是這種工作仍是在艱苦的狀況下完成的。

抗戰以來，已經五年，這五年之中，尤其到了最近的一兩年，整個的國家受到無數的危疑震撼。這個當然影響到人民底心理和生活。我們都在度著最艱辛的歲月，不過這是一般人共同感受的，姑不必論。

自從二十七年離別家庭，到達樂山以來，二十八年的冬季泰興便淪陷了，全家在淪亡的境地掙扎，只有我在這數千里外的大後方。路途是這樣遠，交通是這樣不方便，一家八口談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沒

有重回淪陷區的意志。有時通信都很困難，甚至三兩個月得不到一些音耗。在我離家的時候，最小的孩子還不到兩月，現在四歲了。聽到他牽著郵差，打聽父親消息的故事，確是有些依戀。大的孩子已經失學，其餘的只有暫入私塾，以免在不快意的學校裏讀書。故鄉是另一個世界，但是我底家庭偏在這個世界裏生活。杜甫說：「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在他已經嗚咽涕零，在我只有不勝傾羨。

後方的生活也不見得高明。日減一日的是體重，日增一日的是白髮。捉襟見肘、扶履穿踵的日子，總算及身體會到。住的是半間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時以後便要焚膏繼晷。偶然一陣暴雨，在北牆打開一個窟窿，光通一線，如獲至寶，但是逢著寒風料峭、陰雨飛濺的時候，只得圍巾覆臂，對著昏昏欲睡的燈光，執筆疾書。這些只是物質的環境，對於精神，原算不到什麼打擊。然而也盡有康莊化為荊棘的時候，只得把一腔心緒，完全埋進故紙堆裏去。這本書便是這種生活的成績。

著書只是一種痛苦的經驗。有的人底著作，充滿愉快的情緒，我們讀到的時候，好像看見他那種悠然心得，揮灑自如的神態。對於我，便全然兩樣。我只覺得是一份繁重的工作。這是一方田，一匹牛正拖著沈重的鐵犁，在田裏一來一往地耕著。套上繩索以後，牛便得向前，步伐儘管滯澀不堪，但是還得耕田。直到這方田耕完以後，才能透一口氣，眼睛已經看到第二方田，那邊還是要牛去耕。生活是不斷地壓迫著，工作也是不斷地壓迫著。

《讀詩四論》出版以後，曾題一首：「彈指蔽泰華，冥心淪九有。小夫竊高名，君子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羨蜉蝣壽！乾坤會重光，相期在不朽。」對於自己，這是一種心理的慰藉。其實僵化的蜉蝣，博物

院裏有時珍若拱壁，而流金鑠石，何嘗不是數見不鮮的事！歐陽修說：「今之學者，莫不羨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事情很明白，道理也簡單之至，不過自己既經擇定這一份工作，便得盡力去做。縱使對於旁人，未必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價值，至少在工作的时候，自己總是這樣想著。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朱東潤自序於樂山寓廬。

目 録

序	一	第九 思想混亂底反映	一二八
第一 緒言	一	第十 南朝文士底動向	一三七
第二 傳叙文學底名稱和流別	一九	第十一 《高僧傳》底完成	一五二
第三 傳叙文學底蒙昧時期	三九	第十二 北方的摹本	一六三
第四 傳叙文學底產生	五二	附錄第一 《東方朔別傳》	一七四
第五 傳叙文學底自覺	七一	附錄第二 《鍾離意別傳》	一七八
第六 幾個傳叙家底風格	九四	附錄第三 《郭林宗別傳》	一八二
第七 傳叙文學勃興底幻象	一〇五	附錄第四 《趙雲別傳》	一八六
第八 劃時代的自叙	一一九	附錄第五 《邴原別傳》	一八九

附録第六	《孫資別傳》……………	一九三	附録第十四	皇甫謐《龐娥親傳》……………	二二六
附録第七	《曹瞞傳》……………	一九七	附録第十五	釋法顯《法顯行傳》……………	二一八
附録第八	鍾會《張夫人傳》……………	二〇三	附録第十六	陶潛《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二四二
附録第九	何劭《荀粲傳》……………	二〇五	附録第十七	蕭統《陶淵明傳》……………	二四四
附録第十	何劭《王弼傳》……………	二〇七	附録第十八	釋慧皎《晉廬山釋慧遠傳》……………	二四六
附録第十一	夏侯湛《辛憲英傳》……………	二〇九	後記……………	陳尚君……………	二五五
附録第十二	傅玄《馬鈞序》……………	二一一			
附録第十三	郭冲《諸葛亮隱沒五事》……………	二一四			

第一 緒言

傳敘文學是文學底一個部門，發源很古，到了近代，更加引人注意。二十世紀以來，在文學範圍裏佔有很重要的位置。西方每年出版物中，傳敘文學是一個大宗。關於傳敘文學底理論和派別，在最近也經過不少的波動。祇有在近代的中國，傳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世界是整個的，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底意識，激盪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溫故而後知新，在這個時代裡，我們對於古代傳敘文學底成就，確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傳敘文學是文學，然而同時也是史；這是史和文學中間的產物。現在就分史和文學兩個方面討論。

傳敘文學是史，但是和一般史學有一個重大的差異。一般史學底主要對象是事，而傳敘文學底主要對象是人。同樣地敘述故實，同樣地加以理解，但是因為對象從事到人的移轉，便肯定了傳敘文學和一般史學底區別。率畧地說，文化較舊的民族，比較地注重事，而文化較新的民族，比較地注重人；因此一般史學底發達較先，而傳敘文學引起多數人底注意，乃是較後的事。這個當然祇是一個率畧的說法，而

且因為時代底急轉，也許會引起必要的修正，姑不深論。

其實就在史的敘述裡，也不免看出記載底重心，一步步從對事移轉到對人。龜甲文底下射獵，卜征伐，這是事。金文底下鐘鼎，作敦盤，這也是事。乃至《春秋》隱公十一年的記載，「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這還是事：公及齊侯鄭伯，都是人，不過在這種簡單的記載下面看不出人性的輪廓，所以也還是事。但是到了《左傳》底記載，便完全改樣了。我們看到「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看到「子都自下射之顛」；看到鄭莊公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又看到他詛子都；看到羽父請殺桓公；看到隱公底遲回；以後又看到桓公羽父底凶悖。這裡的重心便移轉到人了。從《春秋》到《左傳》，正是從對事到對人的例證。

但是《左傳》還是史，不是傳叙。為什麼？因為《左傳》寫人，仍舊着重在人性發展中的事態，而不是事態發展中的人性。主要的對象還是事而不是人，所以《左傳》是史而不是傳叙。同樣地《史記》底全部也是史而不是傳叙。一般的史傳也是史而不是傳叙。

跟著英雄崇拜這個觀念底抬頭，大眾開始認為萬事萬物祇是英雄底事業，英雄是宇宙底主宰，是人類底導師，認識了英雄，便認識了一切。這樣便促進了對人的注意，而傳叙文學因此也受到更大的推動。這裡的英雄，當然不專指軍人，凡是佔據領導地位的宗教家、思想家、詩人、文人、科學家、工業家，以及音樂家、藝術家，都是。在這個觀念下面產生了無數的傳叙。

不過假如認為世界祇是英雄底事業，因此便注重英雄底記載，在邏輯上，這裡所重的也還是事，而不一定是人。英雄在事態發展中，流露了英雄底個性，這個固然值得我們重視，然而世界畢竟是人底世

界，一般人底世界而不是幾個英雄底戰場。每人底情感有喜怒哀樂；每人底身世有悲歡離合；在靜的時候，他有神態儀容；在動的時候，他有言語舉止。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敘文學家底手裡，都可成爲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底生活，都是傳敘文學底題目。

傳敘文學是人性真相底流露，所以在熟練的傳敘文學家底手裏，任何一個人底生平，都可以寫成一部動人的傳敘——這個當然祇是理論，在事實上也許還要受到其他的牽掣。一點是狼明顯的，每個人底生平，都有獨特的色采。一棵大樹有成千成萬的樹葉，要找兩張大小形式顏色脈絡完全相同的葉片，便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萬一偶有類似的兩張，但是神態姿勢，還是絕對不同。

傳敘文學是史，但是牠底主要對象是人，所重視的不是事實具體底記載，而是人性真相底流露。這是重大的差異。傳敘文學也是文學，但是和一般文學也有重大的差異，這裡所說一般文學底意義，特殊是指中國的文章。

《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這是指的畫績之事，但是後來的文章，完全妃青儷白，恰恰走上了這一條路線。《文心雕龍》指陳用字的規律，「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聲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練字》關於字形底方面，尤其特殊。牠說「瘖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黹而篇闕。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同上。在宮商方面，《雕龍》說得最詳細，「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聲律》從這些地方，我們看出中國人對於文章是怎樣

地重視。文章是一種完美的藝術作品。在聽的時候，我們要牠宮商調叶，音調鏗鏘；在看的時候，我們又要牠行列勻稱，肥瘠適度。這類的文章，在六朝時最盛，唐宋以後，漸漸地衰落了，但是一直到清代，我們還看到這種優秀的作品。就是在一般的散文裡，作家也還注意到音律。清代桐城派因聲求氣的主張，正是一個有力的回響。前人流傳下來的關於鍊字鍊句的教訓，更是數不勝數。這些事代表一種觀念。

但是這種觀念所產生的文章，往往成爲枵響。聲調好聽，甚至形式也好看，但是後面祇是空的。韓愈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薦士》這雖然祇就其時詩體而論，正不妨直指整個的六朝文學。其後蘇軾論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韓文公廟碑》八代底衰微，是無可諱言的。衰在那裡？衰在祇注重文章底表面而忘去了文章底意義。於是真正的文學，便在形式的文章下面犧牲了。在傳敘文學方面，讀到王僧孺《任府君傳》，庾信《丘乃敦崇傳》，我們時時都有這樣的感想。這裡所寫的人，不是生人，而祇是粉捏化生，泥塑摩睺羅。也許這是文章，然而不是傳敘，甚至不是文學。這便是以辭害義。六朝的作品，常有這種病態，但是唐宋以來，這種病態依然存在；捏粉塑泥的藝術退步了，並不能證明化生摩睺羅不是化生摩睺羅而是血肉瑩好的生人。

文學已經到了蛻變的時期。在這個蛻變的時期中，我們會有進展，然而我們也必定有犧牲。其實從唐宋以來，我們正在做着不斷的犧牲，這原不是現代特有的事。書法是一種藝術，在藝術達到高潮的南朝，文人揮筆都成妙境，所以劉勰高談參伍單複，磊落如珠。但是唐宋以來，便談不上；韓愈底《鸛鵲賦》，恰恰證實黯黯篇閤底可憎；蘇軾底筆仗，在後代是第一流，但是決趕不上晉人底高風逸韻。所以在字形方面，祇得犧牲。音律方面，雖然劉大櫟侈言「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

妙」；《論文偶記》但是要比「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文章，便如村塾兒童遇到三河少年。我們怎能說不是音律的犧牲呢？我們循着這條路線走去，必然還有更大的犧牲。這個必然會使我們惋惜，甚至會使我們追悔。《文心雕龍》說過，「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情采》我們祇得引以解嘲。不過看到鉛華落盡的情態，也許有些惆悵。

現階段的傳敘文學應當怎樣呢？我們祇能提出「傳人必如其人，記事必如其事」的主張。這個祇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的主張，不能算是新，不過對於一般傳敘文學，也還有相當的價值。

中國古代對於傳敘文學底意義，認識最清楚的，是作《朱子行狀》的黃榦。他底一篇《行狀書後》，建立了他對於傳敘文學的理論。他說：「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黃榦又有《晦庵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文》，自稱「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藁，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徧復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之鮮，而行狀之作，不容以自己也。」

傳敘文學底價值，全靠牠底真實。無論是個人事蹟的敘述，或是人類通性的描繪，假如失去了真實性，便成爲沒有價值的作品。真是傳敘文學底生命。

要能取信，第一便須有徵。《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因為不足，所以不能徵，因為不能徵，所以也就不能言，這是孔子也無可奈何的事。果真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那麼必定因為隱、桓以前，魯史已無可徵，所以祇能從隱公元年寫起。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也是第一部史傳底總集。《史記·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言：「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從一部《史記》裏，我們看到他所讀之書，所交之友，所游之地，以及所問之故老。他底半生，消磨在史料底搜尋上面，我們不能不欽服他底勤勞。再進一步，我們更看到他在立傳的時候，務求材料的充實，甚至開國功臣，即如魯侯之類，儘管和樊、鄴、滕、灌齊名，並有功狀可據，功位可考，仍舊不為立傳。司馬遷寧可冒着記載不備的嫌疑，却決不肯作不根的敘述。《樊鄴滕灌傳贊》：「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他廣是樊噲之孫，這是口說；再證以《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余讀高祖功臣」以及《惠景間侯者年表序》之「太史公讀列封」的記載，然後纔加以敘述。再次司馬遷對於梁趙諸人底事迹，所記特多的原故，和他熟識的梁趙之士，如馮遂、壺遂、田叔之類，當然也有相當的關係。（蘇轍言太史公與燕趙間豪俊交遊，其言不可信；太史公交遊中無燕人，故記燕事亦特少。《燕世家》之作，則本諸燕史，大致其時燕史尚有殘存，故本之以作《世家》，其言「子今王喜立」，又「今王喜四年」，則燕史原文，太史公未及刊定，今尚殘存，可證。）就是周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在高祖初年都曾立大功，有《功臣表》功狀可考，但是《史記》不為立傳，在本紀中也無可考，大致也是徵信不足，不完全因為他們是呂后之兄的原故。

總之作史傳不易，作傳敘亦復甚難。後代文人常常徇家屬之請，作行狀，作墓誌銘、神道碑，甚或根

據死者家屬之言，爲之作傳。其實這是信今傳後的作家，所當審慎考慮的事。黃幹《朱子行狀》成後十餘年中，就正於四方之朋友，「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這實在是一種正確的態度。

在真實性底方面，西洋傳敘文學家都比較地更慎重，其記載也更翔實。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底超越。一部大傳，往往從數十萬言到百餘萬言。關於每一項目的記載，常要經過多種文卷的考訂。這種精力，真是使人吃驚。這種風氣，在英國傳敘文學裏一直保存到維多利亞時代。一切記載，更加翔實而確切，而證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艱辛，於是引起二十世紀初年之「近代傳敘文學」。這一派底作風，總想活潑而深刻，同時極力擺脫證件的桎梏。其實仍是一步步腳踏實地，沒有蹈空的語句。斯特拉哲所著《維多利亞傳》，算是這派開山之作了，但是薄薄二百幾十頁的傳敘，便引用了書籍七十二種，其他出版物四種，每一小節的記載，雖然避免引語的累贅，也常常注明三五種出處。因此文字儘管活潑，其實仍是非常典重。研究西方傳敘文學者，要忘去這一點，便會走進不測的深淵。

傳敘文學既然重在真實，我們應當怎樣取材呢？西方人常說，每個人底生活，最好由他自己寫。因此在此取材方面，常常注意到傳主底自叙、回憶錄、日記、書簡、著作這一類的東西。在中國還有自著的年譜：例如明末陳子龍、黃宗羲，都有自撰年譜。

西洋傳敘底第一章，常常引用傳主底自叙或回憶，因爲這是出於傳主底自述，所以篇首便能引起讀者底信任。不過我們應當知道自叙或回憶，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自稱爲南正重北正黎之後，這個姑且說是下語不當，遂似一人兩祖；其後又稱周程伯休甫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實則春秋之時，晉、齊、楚、宋、陳都有司馬氏，安見必爲程伯休甫之後。白居易自稱白氏出於白乙丙及白

公勝，更是一個非常荒謬的錯誤。本來作自叙的人多在老年以後，正是記憶力消失殆盡，自信力亢進非常的時候，寫作之時，既不易博考已往的書簡或其他的證件，而且也不願，因此無論自叙或回憶，都不一定是翔實的敘述。人類對於往事的記憶，常因受到心理上必然的影響，以致無形之中往往變質，所以儘管作者沒有掩蔽事實的存心，但是在傳叙家採用的時候，仍舊不能不給以審慎的考慮。

日記當然是一種價值更大的材料，運用在傳叙裡，常能博到讀者底信任，尤其在一件大事的敘述裡，更易喚起當日的精神。朱子《張魏公行狀》記張浚在平江興兵討逆那一節，最容易動人，顯然地曾經利用張浚日記底斷片。古人留下的日記雖不多，但是近代如《曾國藩日記》、《翁方綱日記》，不但是很好的傳叙材料，而且也是很好的史料。不過發表的往往不是全部的日記，而且因為一般人沒有感到傳叙文學對於傳主的價值，死者底遺族自己既不能利用，同時也不容許別人利用，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寫作日記的時候，一則逐日記載，不致遺忘；二則作者本不豫備發表，不會因為心理的影響而發生變形變質的弊病，因此對於傳叙家確是一種比較可靠的材料。西洋傳叙文學久已盛行，名人日記難免存心留待天下後世，因而有記載不實之病。這一種徵象，在中國還沒有，不過不久以後，會流傳過來，而且因為一般人底信義感不甚健全，辨別真偽的興趣又不甚濃厚的原故，一經流傳，勢必變本加厲，這是可以豫見的。

書簡更是一種很好的資料。西洋所稱為書簡傳的著作，簡直全部取材於此。書簡最能流露作者底性情，讀過流傳下來的東坡尺牘、山谷尺牘之類，對於蘇軾、黃庭堅底為人，也許比讀《宋史》本傳可以認識得更親切。明清之交，流行許多尺牘選本，受人推重，大致也是因為更能流露作者性情的緣故。但是書簡是一種藝術，除了幾個文人以外，能够運用自如的人，還不很多。政治生活中的人物，更加假手幕僚